

思想理论 十年风云

(1978—1987)

SIXIANGLI
LUN
SHINIANFENG
YUN



青岛出版社

思想理论十年风云

(1978—1987)

| | | | |
|-----|-----|-----|---------|
| 顾 问 | 王宏彬 | 王鹏程 | |
| 编 委 | 杜学斌 | 徐小明 | 周 伟 胡良文 |
| 编写者 | 杜学斌 | 徐小明 | 周 伟 胡良文 |
| | 夏桂玲 | 赵宏远 | 王本颖 郭淑英 |
| | 于 森 | 赵 琨 | 范 瑜 王占乙 |
| | 宋文舸 | 车德文 | 王丽宇 王雁菊 |
| | 吴华章 | 陈海滨 | 魏东力 |

青岛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凤英

张 恒

封面设计：朱德海

思想理论十年风云

(1978—1987)

中国医大青年教师编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岛四方印刷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32开(787×1092毫米) 15.25印张 2插页 320千字

印数1—2200

I S B N 7-5436-0345-4/D·9

定价：5.10 元

前　　言

本书是由中国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的青年教师编写的。目的是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理论方面的发展情况和思想理论界的各种意见理出一个脉络，以便对这10年间的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10年。这10年，由于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飞跃，在各个方面都有惊人的变化。在思想领域也有相当的进展。有些研讨加深了，有些则打起另外的旗帜，讨论、争鸣发展了起来，各种思想、观点都在历史面前表现了自己，使这十年成为纷纭复杂、思想交错和斗争起伏的10年。了解这样的历史，掌握发展的轨迹，对于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理论工作者是十分必要的。本书就是这种自我学习的产物。

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对搜集的资料进一步整理，选出在思想领域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60个问题，按年代进行了编排，形成本书。之所以要按年代编排，是为了使读者能够从纵向和横向的各个方面、各种座标上了解各种理论问题的发展情况，便于检索和立体地研究。

本书最初的宗旨是为有志于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提供一本图像清晰的资料书，因此，在编写中仅做客观的介绍，不加任何主观意见，以便于真实地了解各方面情况。

本书初稿形成时，我们曾走访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宣传局、文艺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国务院经济和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以及辽宁省委宣传部等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许多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编 者

1988年9月于沈阳

出 版 者 的 话

本书由中国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青年教师编写，全书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0年间发生在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介绍。在编写过程中，作者既力求作比较客观地记述，又融进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重大问题上，思想倾向基本是正确的。

由于本书成稿于1988年年底，付印前根据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对原稿清样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但其基本思路仍停留在今年春夏之交我国所发生的动乱、暴乱以前的水平。书中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和评价，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就不尽妥当了。例如：在介绍批判封建主义时，未介绍和指出一些人打着批判封建主义的旗号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在介绍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未能体现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指导思想与一些人的错误观点之间的斗争，因此也就不能反映这两次斗争与后来动乱、暴乱的联系；对严加其、苏绍智等人的观点，基本上采取的是不加分析的“客观态度”，有的地方对他们的观点介绍较细（如社会主义存在异化、文学主体性等），而与之相对立的观点介绍得比较简略。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缺陷，如在谈“双百”

方针时，较多地谈了左的干扰，对右的倾向未提及；在介绍关于文化传统的讨论时，未能指出一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等等。

要完全解决上述问题后再付印，困难很大。鉴于这是一部资料性的书，材料比较丰富，对了解1978～1987年这10年间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斗争和重大进步，对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具有一定的意义，我们还是将此书奉献给读者，希望读者有分析地阅读。

1989年12月

目 录

1978

- | | |
|---------------|------|
| 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3) |
|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 | (12) |
| 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讨论 | (20) |
| 关于“伤痕文学” | (25) |

1979

- | | |
|--------------------|------|
| 理论工作务虚会和拨乱反正中的不同意见 | (37) |
| 思想解放中的各种错误思潮 | (42) |
| 关于“过渡时期”的讨论 | (49) |
| 报告文学的兴起及其含义 | (56) |
| 新时期文学创作问题上的论争 | (63) |

1980

- | | |
|----------------|-------|
| 关于评价“文化大革命” | (73) |
| 关于干部制度和领导机构的改革 | (80) |
| 关于批判封建主义问题 | (87) |
| 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 | (94) |
|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 | (102) |
| 文艺界“反传统”思想的发展 | (109) |

1981

| | |
|--------------------------------------|-------|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对建国 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 | (119) |
| 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 (123) |
| 批评《苦恋》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倾向 | (130) |
| 关于精神文明的理论探讨 | (138) |
|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讨论 | (145) |
|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讨论 | (153) |
| 对个体经济的理论探讨 | (162) |
| 文学上的开拓活动 | (169) |

1982

| | |
|----------------------|-------|
|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探讨 | (179) |
| 对人的价值的继续探讨 | (189) |
| 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和“萨特热” | (198) |
| “共产主义渺茫论”和共产主义的再教育 | (209) |
|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纲领 | (215) |
| 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222) |
|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 | (229) |
| 文艺工作方针的转变和对文艺工作者的新要求 | (236) |

1983

| | |
|---------------|-------|
| 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 | (243) |
| 对思想战线精神污染的批评 | (245) |
| 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的再提起 | (251) |

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争鸣 (258)

· 文艺界“新潮”和文艺发展方向的争论 (266) ·

1984

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和经济体制改革 (277)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285)

关于爱国主义的宣传及讨论 (296)

关于婚姻道德、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的讨论 (303)

关于“文学是人学”和文学与人性关系的讨论 (310)

1985

新技术革命和对《第三次浪潮》的评价 (321)

关于哲学现代化问题 (332)

关于价格改革的理论探讨 (338)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和体系的讨论 (345)

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中提出的问题 (354)

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创作自由” (365)

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讨论 (369)

1986

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探讨中的不同意见 (379)

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 (387)

纪念“双百”方针30年 (397)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论争 (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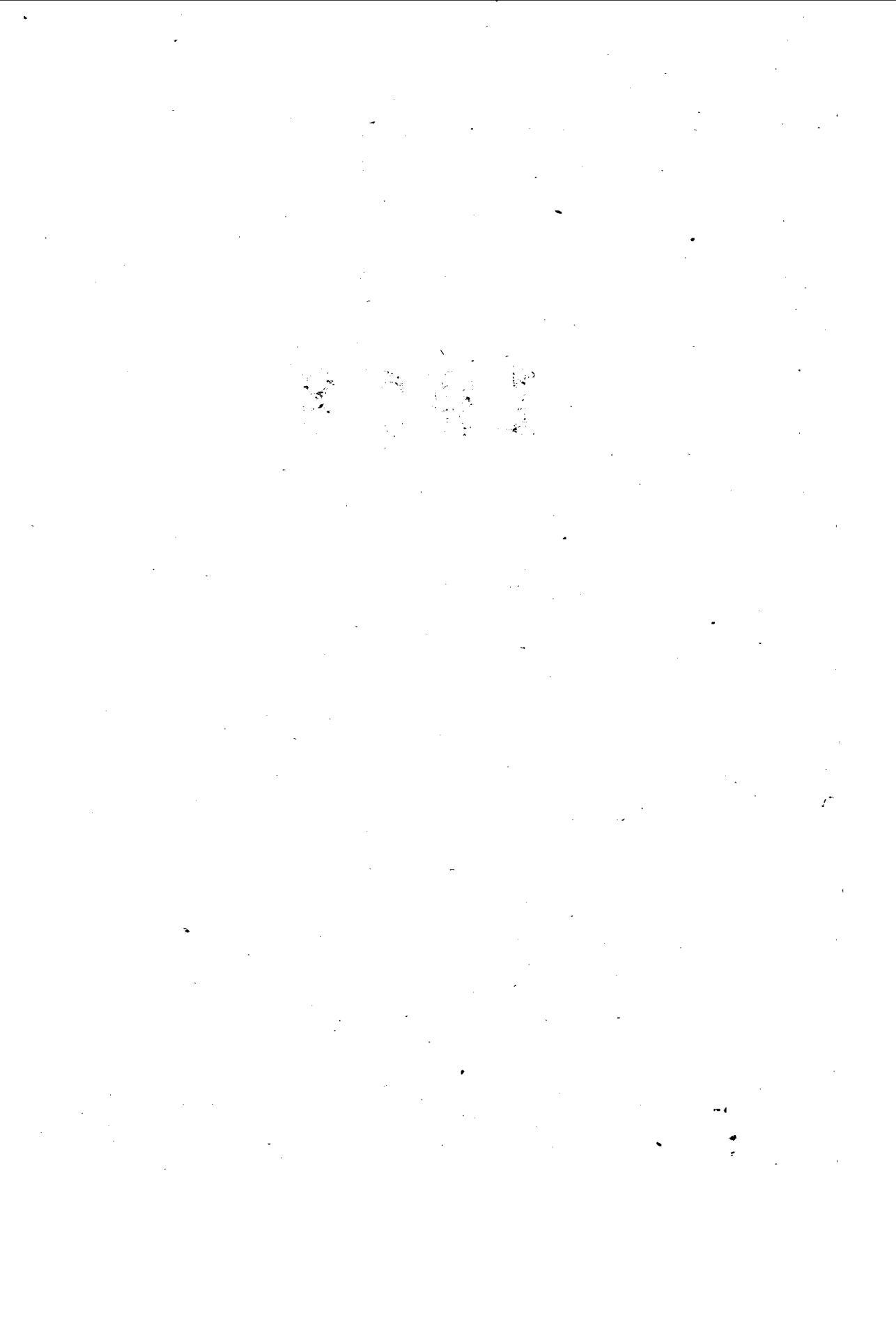
中西文化对比的讨论 (410)

所谓的文学“新潮”和论战 (420)

1987

- 反自由化斗争 (433)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 (444)
关于城市承包经营责任制 (451)
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 (457)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 (462)
关于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 (472)

1978



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一、讨论发生的背景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各个方面开展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工作，揭发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进行了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平反了一部分冤、假、错案，恢复了工农业生产，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错误路线和“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受到触动，某些方面甚至还在继续，党的“十一大”上仍然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提法。这一切使许多工作无法走上正轨，因此，在揭发批判江青集团中，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地要求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特别是纠正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要求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等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在这样的要求面前，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时的错误路线，坚持“继续批邓”，一再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文化大革命”中流毒很广的反动理论、思想、口号（如“全面专政”）等设下重重障碍，阻挠对其进行批判，使拨乱反正和整个建设工作难以顺利进行。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凡

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以后，他多次重复过这个主张。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诸于社会。3月10日至2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坚持这个错误方针。

华国锋同志所讲的“凡是”，并不是要把毛泽东同志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针发展下去，而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即“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去。搞“两个凡是”，就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华国锋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样的错误方针，阻挠着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彻底纠正。

二、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华国锋等人提出“两个凡是”以后，邓小平最先反对这一错误方针。1977年4月10日，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里提出“准确”、“完整”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原来在党内、政府和军队中的全部领导职务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指出“两个凡

是”方针的错误所在。这时，开始出现一些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1977年冬，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时，对于研究党史问题曾明确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二是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登载了署名张成的一篇思想评论《真理只有一个》。文章只有一千多字，谈到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认识史上老大难问题，同时谈到毛泽东也主张标准只有一个，把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等观点。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引起重视。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由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发表时作了些改动），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基本道理；说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指明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才是对的”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文发表，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也有一些人提出非议和反对的意见。当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

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提出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对讨论进行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理论工作者纷纷发表意见，撰写文章达数百篇。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也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样的讨论，在粉碎“四人帮”后是空前的，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三、讨论中的各种观点

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讨论中，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史上众说纷纭，没有一种学说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由于它把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认定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理由是：

第一，由于认识来源于实践，因而认识的正确与否，也要由实践来证明。离开实践来谈认识的正确性，就会陷于纯粹经验哲学，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也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的“只能”，就是说检验